

刘少奇与他的农民通讯员

□ 姚 远

特邀农民通讯员进京交谈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拉开了我国工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

为了了解人民群众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看法，刘少奇打算托人捎信给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今宁乡市花明楼镇），请乡亲们选派几位老农到北京来，当面与他们促膝谈心，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刘少奇在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受刘少奇的委托，从北京回到家乡过暑假，带来了刘少奇的口信：希望家乡的基层领导干部能够选派几位老实、有经验、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谈谈心；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

刘正山回乡后，找到了农会主席王升平等人，请他们拿主意。经过反复认真的协商、比较、筛选，花明楼乡干部最后决定选派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4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9月初，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代表到北京相聚面谈。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接待人员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车车载着4位身份特殊的农民七拐八弯地来到了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这时，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几只书柜、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拉家常罢，刘少奇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等方面

的情况。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乡下实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

4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代表异口同声地回答：“能够做到！”

通过与农民通讯员的书信往来及时了解乡下实情

当时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的王升平和乡长邓子卿，也想进京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但是因为他们不是乡干部脱不开身，还因为他们年轻，不够老农资格，没有被选上。于是，王升平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托成敬常亲手交给刘少奇。

令王升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后的10月23日，就收到刘少奇的复信：“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的来信，请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是好的，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瞒。”王升平、邓子卿和乡亲们读着

刘少奇的来信，心里说不出有多么激动。

1954年，刘少奇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后到处宣扬说刘少奇如何如何热情地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了奖励，给了他们一笔钱……讲得有鼻子有眼的。

王升平听到后，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有什么功可报的呢？于是，王升平便给刘少奇写了第二封信，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之外，还着重说到了那两人进京造成的不良影响。

没过多久，王升平就收到了刘少奇的第二封亲笔回信：“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真实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我不知道，通过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回乡调研期间当面对农民通讯员深入体察民情

1961年4月2日至5月16日，刘少奇轻装简从，专程来到湖南省宁乡、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5月3日，刘少奇回到他阔别40年的故乡炭子冲，继续他的调查走访。回到故乡，刘少奇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农民通讯员。

5月4日，刘少奇请来少年时的朋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

5月6日上午，刘少奇找来他的农民通讯员之一、原炭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王升平，亲切地问这问那。一阵嘘寒问暖后，话题自然而然转到工作上，刘少奇问：“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

从早上到中午，刘少奇与王升平

谈了3个多小时。时值午饭时分，刘少奇夫妇热心地挽留王升平同他们一起吃了顿便饭，边吃边谈。刘少奇明白王升平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当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饭后，当王升平告辞时，刘少奇紧紧握着王升平的手，嘱咐道：“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总共调查了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20多场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找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为当时党解决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确凿的依据，同时也把党的政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把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展示在了群众的面前。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重大突破是，根据刘少奇等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广大农村干部、社员的愿望，取消了分配问题上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强调严格评工计分；并针对大家关注的食堂问题提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还对保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新条例颁布后，农村情况逐渐有所好转，农民生活逐步安定，生产普遍有了发展，粮食产量逐步回升。

（摘自2018年第12期《党史纵横》，原标题为《刘少奇调研求真话》）

中国共产党第一面正式党旗的诞生

□ 永 昌

党旗，是党的象征，早在红军时期，就有新党员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的记载。当时的党旗是各级党组织模仿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旗的样子自己制作的，规格和式样各不相同。

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作出了关于中共党旗式样的决议，决议中说：“中共党旗样式宽阔为三分之二之比，左上角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不久，第一面中共正式党旗就在延安诞生了。

（摘自2000年第8期《党史文苑》，原标题为《第一面正式党旗的诞生》）

周恩来尊重党规的两件小事

□ 简 奕

延安整风期间，南方局机关每周安排一天作为党日。通常这天下午在红岩嘴13号一楼“救亡室”内举行学习报告会，主讲人主要是周恩来、董必武，还有南方局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像郭沫若这样的专家。一到这一天，南方局机关驻城里曾家岩的同志都回到红岩山上。有时《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也来参加。山上山下，团圆会师，非常亲热。

当时整风学习氛围很好，主讲人一请就来，领导同志还主动提出讲题。听讲时，没有人迟到早退，也没有人窃窃私语。由于大家都很主动热情，负责组织学习报告会的张黎群担子并不重，只需要做好会议记录。

南方局某部门有位主要负责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为人不拘小节。听报告时，他总爱拍把藤椅，放在门口，跷起二郎腿。他往门口这么一坐，进出的人都不方便，一时间颇引人侧目。为此，张黎群提醒他搬回室内。他摇头不理。

后来他看见了，把他叫起来，问道：“你在专心听报告吗？你这是遵守学习纪律吗？”周恩来神态严肃，声音洪亮：“你以为自己资格老，自

以为懂得多，满足了，不在乎了！”接着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周恩来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党小组活动，主要讨论如何加强反特工作，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小组会上，大家也畅所欲言，气氛非常热烈。

临近结束时，党小组长刘光说：“请周恩来同志作总结。”大家都想听周恩来总结，立即摆出本子，竖起耳朵，准备一字不漏记下来。

周恩来忽然问起谁是我们的小组长，一位快嘴同志说是刘光。周恩来说：“呵，该小组长作总结。你对我这个党员有什么要求，给什么任务，我都接受。可是，你要我代替你作党小组会的总结，不大合乎党规吧？”

他接着又说：“党员，起码一条要参加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志。开党小组会，我们都要受组长领导。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

党性不仅体现在大是大非上，也体现在这些细节中。周恩来对党规的尊重与践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摘自2016年1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为《周恩来严守党规》）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延安给朱德总司令当警卫员的那段往事。

在和朱总司令朝夕相处5年多的时间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那可亲可敬的一言一行，既代表着我们党和军队的形象，又深深地影响着我这个普通战士的一生。

1940年的金秋时节，我正在总政治部保卫部学习。一天上午，微风阵阵，金色的阳光洒满延河两岸。宜人的天气使人心旷神怡。这时，我和学员们一道正走向学习的课堂，忽然被一位仪表堂堂的高个子军官拦住，他严肃而认真地向我宣布了一道上级的命令：即去朱总司令身边当警卫员。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怦怦乱跳，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当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怎么也合不上眼睛，称心和不称心的事一齐涌上心头。在旧社会里，我作为穷人家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上不起学，被人瞧不起的惨景，勾起我一阵阵心酸；红军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参加了红军，经党组织培养教育，成了一名革命战士，享有了做人的权利，这激起我一遍遍幸福的回味；现在，党又把保卫总司令的重任交给我，更使我感慨万分。思前想后，一种强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好党交给我的这一重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当好总司令的警卫员。

第二天，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我匆匆收拾了行李，便去杨家岭报告。

刚到总司令身边不久，寒冬便悄悄来临。当我第一次看见总司令穿上一件已经发白的打着补丁的旧棉袄时，心里没有在意。可是，日复一日，那件旧棉袄好像老是跟随着他，从没有见他换过。我十分好奇，便向一些老战士打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朱总司令那件旧棉袄不知伴他度过了多少个严冬。我们到他身边后，每年冬天他就一直穿着。”

看着总司令老是穿着破棉袄，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在未向总司令请示，也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我便自作主张，一定要想办法换下那件旧棉袄，主意打定后，便开始秘密地筹划，满以为将生米煮成了熟饭，总司令定会默许的。

一天外出办事，凑巧遇上了后勤被服厂的曾主任，我拉着他的手寒暄了几句后，便试探性地问：“总司令穿的棉袄太旧了，做件新的换掉它怎么样？”曾主任瞟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又急切地问：“行不行，说句话嘛！”他这才提醒我说：“没有征得总司令的同意，恐怕不容易办成喽！”我信心十足地说：“没问题，我想办法说服他！”曾主任见我很有信心，就问：“缝好大尺寸？”我就豫片刻后说：“总司令和我的个头差不多，只是他比我胖些，反正做大一点就行了。”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达成了这项协议。

没过多久，新棉袄做好了。一天

朱德的旧棉袄

□ 金海贤、口述 苟文俊（整理）

晚上，趁朱总司令稍闲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地将棉袄送去。这之前，我也反复想过，要有受批评的思想准备。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出现在朱总司令面前时，他一看我的举动好像全都知道了，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没待我开腔解释，他指着我怀中的棉袄严肃地问：“是谁出的主意？”我恳切地回答：“是我自己！”总司令更加严厉了，加重语气说：“同志，我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叫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总司令发这么大的脾气，一时难以承受，脸红了，手脚也不听使唤了。总司令见我很委屈的样子，马上缓和了态度，走到我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小金呐，我们现正处在困难时期，任何人都应该搞特殊，尤其像我们这些人，更要以身作则。将来，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嘛。我的棉衣还可以穿，新的就送回去吧！”听总司令这么一讲，我全明白了，他是为维护党和军队的形象，为了人民的利益，才甘愿自己吃苦的。想到这里，激动的泪珠早已充满了我的眼眶，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只能点头称是。当我告别总司令时，他又叫住了我，“要记住，以后凡是给我添什么用具和衣服，一定要先问问我，再不要先斩后奏喽！”这朴实无华而又幽默的话语，终于撞开我内疚的心扉，我立即爽快地表示：“坚决照办！”

棉袄没换成，却让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终身受益。当我把新棉袄送还给曾主任时，他开玩笑地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吧！留着它，以后需要时再来取吧。”可是，到1945年秋冬之际，我因工作变动要离开总司令时，那件又添了一些补丁的旧棉袄仍然穿在他的身上。

（摘自1997年第12期《党史文苑》，原标题为《全军统帅普通一兵——忆朱德总司令二三事》）

邓恩铭成立狱中党支部

□ 张琳珏

1921年7月，年仅20岁的邓恩铭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此后，他在山东等地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工运工作。

1925年11月7日，邓恩铭因组织领导罢工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被重刑审讯，遍体鳞伤。此时，他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所幸，当时他化名“黄伯云”，敌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两名同乡的担保下，邓恩铭得以“保外就医”。

1929年1月7日，邓恩铭从淄博矿区赶到济南，与负责党的秘密联络工作的余修同志碰头，他说：“王复元叛变投敌，他知道你的身份和你目前的活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不能迟于明天清晨。”余修希望邓恩铭和自己一同转移，但被邓恩铭回绝了。邓恩铭为保护和安置济南一大批革命力量，不幸于1月9日落入敌人手中。

起初，邓恩铭虽被多次残酷审讯，但并未暴露。他主动担负起领导狱中斗争的艰苦重任，组织成立狱中党支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狱中斗争。7月21日晚，在邓恩铭的指挥下，难友们有计划地控制了两道大门，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难友们伺机冲上大街，分路疏散。由于邓恩铭受刑过重，身体虚弱，行动困难，他被敌人捕回，打入死牢。

1930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审讯共产党人。由于张苇村是国民党元老，对邓恩铭十分熟悉，很快认出了化名“黄伯云”的邓恩铭，在审讯室里直呼“邓恩铭”。邓恩铭冷笑一声，捋了一把杂乱的头发，昂首说道：“是，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恩铭！”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同其他21名共产党员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年仅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

（摘自2016年第7期《中国纪检监察》，原标题为《邓恩铭：对党忠诚 坚贞不屈》）



井冈山时期的油灯

□ 杨海峰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力量的壮大，对敌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进行多次“进剿”和“会剿”，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当时，在井冈山上，由于敌人的封锁，生活越来越难，部队所用的粮米油盐、服装弹药日见短缺。部队用油非常少，煮菜、点灯都少不了油，而油又在敌人手里控制着，在最困难的时候则几乎见不到油了，油和其他物品一样成了宝贝。为

